



西山区文史资料选辑

4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昆明市西山区委员会

编印

西山区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昆明市西山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八月

编 委：

牛尧宗 刘迪芬 李承宽 杨履元
赵鹤年 邢蜀曾 徐振明 张树春

编 辑：

赖 滔 杨树春

封面设计：武培根

校 对：赖 滔 杨树春

目 录

- 昆明义勇自卫总队第四大队始末 施万惠 李星光 (1)
回忆解放前夕昆明西郊部份农村反“三征”斗争 苏祥 (8)
我在昆华师范参加学运的回忆 杨云龙 (12)
关于昆明市郊区的地下交通线
(1949年9月至1950年2月) 李星光 (21)
云南水泥工业的摇篮——昆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周如栋 (23)
云南磷肥厂的创业与发展
云南磷肥厂厂志办公室供稿 (36)
忆施嘉干先生在我省、市、区创建民族工商业的情况
杨凤麒 (43)
周自新传略 摘自二九八厂厂志 (47)
西山区小学发展概况 (1907—1986) 杨润 (53)
谷律中学的发展 严楷 (62)
忆先父牛少宾 牛曼卿 牛丽卿 (70)
基督教西山区坝区片恢复发展简述 能大德 (76)
西山区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简介 郑茂森 (82)
滇缅铁路——昆石段话沧桑 张继禹 (88)
碧鸡关隧道 张继禹 (92)

西山区境内厂矿铁路专线	张继禹	(95)
西山区水运事业简述	张继禹	(100)
解放前马街集镇贸易概略	杨树春	(107)
难忘的会见	杨树春	(112)
侵华日机轰炸西山区罪行	徐 贵	(114)
远征军抗日回忆片断	阮鹤斌 口述 栗 德 整顿	(118)
董麟先生二、三事	张绍仪 杨树春	(120)
海源名胜简况	尹发恩	(123)
聂耳墓	赖 滔	(128)
观音山	李学知	(131)
沙朗洞	张光裕 口述 张恩喜 整理	(133)
沙朗温泉	张光裕 口述 张恩喜 整理	(135)
观音洞和仙桥洞	张恩喜	(138)

昆明义勇自卫总队第四大队始末

施万惠 李星光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率部宣布昆明起义（简称“12·9”昆明起义）。在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的时刻，蒋介石为继续盘踞云南作垂死挣扎、妄图恢复蒋家王朝的统治，派出国民党陆军副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汤尧，指挥第八军、二十六军于十二月十六日开始向昆明反扑，欲强占昆明、控制云南，作苟延残喘的挣扎。昆明三十万人民处于紧急危难之中。在这紧要关头，中共昆明地下市委根据边区党委的紧急指示，紧急动员全市人民组织起来保卫昆明，并由地下党员、“民青”、农会会员以及积极份子，组建起昆明义勇自卫总队，武装保卫昆明。昆明市郊区农村组建起总队下辖的第四大队，经过一周紧张激烈的战斗，胜利完成了武装保卫昆明具有历史意义的重任。

第四大队是昆明义勇自卫总队下辖四个大队的其中之一，从组建开始至一九五〇年三月军事接管止，历时三个多月的时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市委委员王维彩，向中共昆明郊区特

支传达了市委指示，即“全党立即动员组织武装自卫。昆明郊区的主要任务是两条：第一，必要时进城参战；第二，武装控制广大农村，万一昆明失守，为中共地下省、市委西撤应变，做好武装、交通及落脚点的准备。”传达完后，郊区特支书记陆介福连夜赶到明朗、龙潭片部署。特支组织委员施万惠，十七日下午带人进城领枪未领到，十八日又率领人员到景星小学领回大枪120支，其中梁家河义勇自卫队员领走90支（自留42支，给其它村的自卫队员48支）。以后昆明郊区各片又到总队部领了一些，先后共领得300余支。在第四大队组建初期，由于战争环境的割裂，没有形成全市郊区的统一领导，加之地区、情况、任务各有不同，有的是总队长王维彩直接指挥，而且东、南、北片又是处于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进攻昆明路线的周围和控制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紧急应变：一是隐蔽党组织的力量，二是帮助群众转移，三是可能条件下组织破坏交通、道路和桥梁，阻止敌人的反扑。处于前沿阵地的金河一带，实施了断桥、沉船；处于危险地带的渔村、马村、麦地村等村庄，立即组织群众转移或做好转移前的准备工作；大板桥虽驻有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的前线司令部，但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掩护和隐蔽下，党的组织未遭到破坏。昆明市西郊，处在昆明保卫战的后方位置，党组织控制着西行通道的全部水、陆交通线及沿线的广大乡村政权，主要任务是搜、借枪支弹药，追捕敌特，维护社会治安，做好中共地下省、市委的西撤应变及落脚点的准备。梁家河的义勇自卫队员，在本村范围内先后搜捕匪特五批20余人，缴获短枪10余支，子弹百余发；在一次夜间巡逻与武装匪特遭遇发生枪战中，匪特惊恐溃退仓皇逃

跑；还参加了大队长施万惠亲自指挥搜捕特务的行动，搜查和逮捕了国民党灵源乡中队长李忠和特务杜兴礼、杜尚礼等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在西安马路一批流氓滋事生非、行凶打人、调戏妇女，梁家河义勇自卫队员赶到抓获后扭送小西门公安四分局。团山片接到“武装人民，保卫昆明”的动员令后，在大团山、黑林铺、官塘子、沙地、昭宗、大村、小村、河底、黄土坡、龙院村、小屯等村的地下农会中紧急动员，组织参加义勇自卫队的达129人，脱产进城的义勇自卫队员17人；武器弹药来源，主要把国民党乡、保组织的武器实行“枪换肩”以及收缴官僚地主、恶霸的长短武器，共收缴得短枪1支、长枪100多支，子弹4153发。武装起来后，护村、护厂，巡逻联防，维护治安，保卫人民生命财产。龙院村的义勇自卫队员尹发恩、杨嘉宾，对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特务龙庆余由龙院村跟踪追击至西站抓获后，用人力车监送义勇自卫总队部；义勇自卫队还对小团山侯进修教授的卫生科研实验室进行了护卫，使之未遭破坏；对资本家陈坦开办的制铜厂，做好厂警的护厂教育工作，并晓以大义后，避免了弃厂逃跑，协商后还拿出了50支枪和2000发子弹，武装农村民兵，配合完成了护厂任务。西碧、明朗、大渔片的义勇自卫队，在王禄意的组织领导下，收缴了地主恶霸和敌特的武器弹药外，私人收藏的长短枪80余支也集中起来，武装了义勇自卫队员和民兵，有效地保卫了社会治安；为避免普坪村广播电台发射塔遭到敌人在保卫战期间的破坏，王禄意通过社会关系，争取了电台内的警卫队长赵椿庭，通过组织武装附近农村的义勇自卫队员，和电台内的警卫队员相互紧密配合，严密守卫，保证了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以及地下省、

市委的指示、部署及时得到传播，有效地保护了电台的安全，保卫战结束后，完好无损地移交省军管会。

十二月十六日昆明保卫战开始至二十二日敌军全部溃逃这段时间，义勇自卫总队第四大队绝大多数没有进城参战。

第二阶段：

十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一九五〇年三月上旬，昆明市郊区的义勇自卫队，统一组编为总队下辖的第四大队，施万惠（特支组织委员）任大队长，指挥机关搬到马市口原国民党省党部，下辖三个中队：西郊为一中队，中队长王禄意（已故）；南郊为二中队，中队长赵永熙；东郊为三中队，中队长郭忠义。这段时间，主要指挥活动形式是，内部实行党组织统一领导，外部以义勇自卫总队第四大队及农民协会的名义活动。主要是对国民党的乡、村政权进行武装控制和利用：

1、义勇自卫队除武装自己外，立即收缴和解除郊区地主恶霸的武器弹药，搜捕敌特，控制国民党的基层政权，维护郊区农村的社会治安。在搜捕敌特中，除金河片一名敌特因拒捕而击毙外，未发生过重大事件，所捕获的敌特均送交了总队部。收缴武器弹药方面，以搜、缴、借的不同方式，立即掌握了郊区农村的绝大多数武器弹药，如莲德镇、三合乡，总队领发的仅20支枪，经收缴借后，达200多支；梁家河领发的仅42支，收缴后达52支；团山片领发17支，收缴后达100余支；大渔、明朗、西碧片，借16支，缴获80多支；普吉片未发枪，但缴获了71支；东郊发50支，缴获步枪、卡宾枪37支，机枪8挺，小炮、山炮各两门，弹药物资两卡

车。通过收缴武器弹药，群众性武装自卫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估计全昆明市郊区农村掌握的土洋枪已超千支。虽未正式接管国民党在昆明市郊区的乡、村政权，但实际权力已掌握在中共昆明市郊区特支、工委领导下的义勇自卫队和农民协会手中。

2、义勇自卫队，在保卫战结束后，继续完成战斗队和工队作的双重任务。中共昆明市委立即抽调和组织大批学生，配备枪支，以政工队员身份到义勇自卫队第四大队加强工作。在中共昆明市郊区工作委员会（十二月二十四日，郊区特支改建为郊区工委，为市委领导郊区农村的派出机构）的规划和直接领导下，在尚未建立农会的759个村，分片包干，立即建立村农民协会，至此，市郊区村村有了农会。一九五〇年三月底军事接管后，在乡、村农会建立的基础上，武装民兵组织也相继建立。义勇自卫队员和政工队员，广泛深入到乡、村农会，以农会组织活动，开展宣传教育、启发阶级觉悟、教唱革命歌曲，激发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

3、义勇自卫总队第四大队，在中共昆明市郊区工委的领导下，与农民协会组织动员郊区农民，捐献和筹备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的柴、草、草鞋等物资。郊区工委由普永寿带队参加，组成昆明市各族各界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先组织一卡车慰问物资，赴泸西迎送四野先头部队，梁家河村由王起、梁炳鉴等十余人组成参加各族各界慰问团，将梁家河村贫苦农民表心意节衣缩食捐献的慰问品：草鞋350双、绣花手帕164块、红糖50公斤、稻草2000公斤、鸡蛋3200多个，载运泸西慰问四野先头部队，在迎送联欢会

上，还奉献了梁家河的文艺节目。泸西迎送慰问四野先头部队回昆明以后，又先后组织参加欢迎“边纵”和二野四兵团的入城活动。一九五〇年二月，义勇自卫总队第四大队，在郊区工委领导下，广泛动员和组织数万郊区农民群众，先后参加了20日夹道欢迎二野四兵团进驻昆明的入城仪式和22日在拓东运动场召开的各族各界十多万人民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盛大集会。参加欢迎的郊区农民，手持三角彩旗，高呼“热烈欢迎”的口号，口号声和歌声在昆明上空震荡、飞扬，汇积成云南从此获得彻底解放的心声。参加欢迎的明朗片六、七百彝族人民，身着节日盛装，由50多里远的山区，提前一天赶到昆明，并带着西碧、明朗片群众捐献的3000双草鞋、8000捆稻草等物资，献给人民子弟兵略表心意，和参加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会后，部份解放军进驻团山片，团山片的义勇自卫队员、农会骨干、妇女会员，热情地接待了解放军指战员，并在班庄村的广场上，组织了欢迎子弟兵的军民联欢晚会。在欢迎人民解放军的组织活动中，义勇自卫队还配合解放军部队，做好党政军领导人和人民群众安全的保卫工作，充分体现了军民鱼水情、宾至如归的深厚情谊。

4、在昆明保卫战期间至军事接管前，第四大队始终担负了对昆明郊区的粮食、库房、电台、机场、公共设施、文书档案、水陆交通等方面的保卫工作，为顺利接管国民党在昆明郊区的财产、档案、政权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方便。

第三阶段：

义勇自卫总队第四大队，从组建、活动到结束，都是在中共昆明市郊区特别支部和中共昆明市郊区工委的直接领导

下进行的，虽然不是一支脱产正规的专业武装部队，但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第四大队下辖的三个中队直接由昆明郊区的中共东区工委、南区工委、西区工委领导，是党组织领导下的一支群众性工农武装，除总队部的警卫中队实行军事化外，其余三个中队均属武装工作队性质，在昆明保卫战期间以军事行动为主，保卫战后以开展群众工作、保卫公共财产、维持郊区农村社会治安为主要任务。第四大队除抽调一部份人员到总队部编为警卫中队外，所辖的三个中队，统编后实有一百四十五人。因在整个活动中，都以义勇自卫队名义进行，在未实行统编前，郊区义勇自卫队员的确切数字难以估料。一九五〇年三月，军事接管国民党在昆明市郊区的县、乡（镇）、村政权后，第四大队的义勇自卫队员转入了民主建政和组建武装民兵的工作，昆明市郊区义勇自卫队的各级领导，也相继成为民主建政的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总队部警卫中队的人员，随同三大队的一部份同志，成为云南省公安学校的第一批学员和省公安大队的第一批队员，现今还有不少人战斗在公安战线的领导岗位上。也有一些同志退居二线或离、退休后、安度晚年。

一九九〇年五月十四日重新
整理于马街

回忆解放前夕昆明西郊部份 农村的反“三征”斗争

苏 祥

国民党政府为了扩大内战，在其统治下的广大农村地区征兵、征粮、征税，他们横征暴敛，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和反抗，一九四六年以前就曾出现过自发的反抗斗争。

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共昆明郊区特支成立以后，反“三征”斗争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在西郊区的红庙村、土堆村、明家地以及梁家河村一带开展起来。

反“三征”，就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征兵、征粮、征税计划，反对他们为了坚持扩大内战而进行的征集兵源、军粮，以及搜括钱财的企图。在组织的指导下，地下党员、民青成员、以及农会会员，个个做宣传发动工作，挨家挨户、个别串联，叫群众不要把自己的子弟，送给国民党政府去打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天下穷人是一家，不给国民党政府一颗粮，不给一分钱。有的同志，通过自家的亲戚、叔伯等关系，一传十、十传百，还有的同志历数在国民党军队里、长官任意打骂虐待士兵、克扣粮饷的事，尤其是士兵一生病，得不到应有的关心和治疗，使病疫迅速蔓延、士兵大

批死亡，在红庙村附近的田野里、菱角塘养鱼塘的埂子上、麻园河埂等地方，躺卧着国民党军士兵的尸体，那是一九四四、四五年间，国民党中央军驻扎在小西门外农村的事实，人们亲眼所见，是地方保甲长派村民们一一将其抬到麻园河埂上掩埋的。

一提起这些事，人们不寒而栗，反“三征”的意义印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

国民党政府的征兵令一下来，通过各种渠道，传给地下组织知道，然后由组织通知应征青年躲兵。躲兵的方法有：跑到亲戚家藏起来，逃到城里去卖苦力，逃到深山老林隐蔽，待征兵期限过后又陆陆续续的返回来。保长白天抓不到人，改为夜间或是天刚亮的时候躲到房前屋后乘其不备捉兵。有个别不信组织劝告的人，被捉住了，被五花大绑捆着，在被押送往区政府征兵站的途中，有的当押运的壮丁，就是我们的农会会员，悄悄地把抓到的人放了。

由于征不到兵，他们的各级当事者，变换手法，改征兵为出钱雇兵，钱从哪里来，由分配着征兵兵额的地方保甲负担，老百姓交不起钱，一部份村的保甲长，就卖公田公地去城里雇兵，大约卖一亩田的钱可以雇一个兵，城里的无业游民，专门在茶馆里，等待乡下的保甲长或绅士去找他们，他们可以受雇多次，就可以多次领取雇佣金，因为他们无固定的住处、胆子大，头天进了昆明师管区的新兵大队，第二天就溜出来了。红庙村及土堆一带就是年年到城里去雇兵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交骡马代金的办法抵服兵役名额，由应征户出骡马代金，一个骡马代金为一石米，合八百斤左右，贫苦的农民是支付不起的，尤其是那饥寒交迫的年代，三

十、五十斤都拿不出来，在地下组织的指导和鼓动下，软拖硬磨，保甲长们也无办法，互相推诿了事，如苏祥负责的红庙村一带。

说到反“征粮”和反“征税”旧政府的征粮有征实（稻谷、麦子、包谷），征购（用法币和金元券向农民购买规定数量的粮食），征借（向所有农户打收据借用粮食），国民党政府为了有效供应内战前线军队的粮食以及后方政府公务员的生活用粮，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农村搞粮食，责令乡保长如期完成，还派出征粮督查员到各乡保催促征粮。在组织的宣传动员和具体指导下，要求各村的农民群众，把收好的稻谷好好的堆码起来，吃一点攒一点，家里不要存放太多的现成粮食，乡保长来催粮，就说天气不好，还没有攒谷子呢。采取软拖硬磨的办法。有的保长还是统战对象，当着上峰派来催粮的人，装做大声呵斥的样子，等这些人走后，也就不再逼农民交粮了，如梁家河村尧汝康负责的就是这样。但也有个别反动的乡保长，寸步不让，农民们只得和他们针锋相对的作斗争，如白塔村乡长蔡思恭老是和人民作对，当地的民青组织、读书会，在张子芳同志的带领下，只有公开和他们作说理斗争。中新街、沙锅等村的农民，听到和蔡思恭作斗争，闻讯后，纷纷赶来参加，大家大声喊到，没有粮，这些堆着的粮是我们农民的口粮，就是不交，你要怎么样？人多势众、慑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这等土豪劣绅，只好灰溜溜的走了。旧政权的征税，主要在农村的小商贩，民族工商业者中推行，因为农田赋税在解放战争末期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已改为征实物了。业者看到广大农民们，不纳粮、拒当兵，他们也参加到反征税的行列中来。

有地下组织的农村，在组织的带领下，抵制了旧政府的“三征”计划和法令，由于当时灾害频频，生产力低下，农民生活很苦，大部份的贫苦农民以及中等水平的农民，除交地租所剩无几还要催逼交纳所谓的“皇粮”，农友们是再也拿不出一点点粮食来了。反“三征”代表了广大农民的意愿，推行得开。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光是灵源乡一乡八个保二十余人的征兵额，实际没有征到一名壮丁。征粮、征税法令也未能如其愿望推行。一方面是地下党组织，认真带领群众起来斗争，另一方面主要的是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威震了旧政府的各级官员，不敢象过去那样的渔肉广大人民了。

（苏祥离休教师）

我在昆华师范参加学运的回忆

杨云龙

1945年春到1947年冬，我在昆华师范49班上学。抗日战争末期，国民党军的陆军总部设在昆华师范前院大楼内，门警戒备森严，直至1946年抗战胜利后方迁走。1945年8月日本投降，蒋介石于9月借机以改组为名，用嫡系部队第五军杜聿明、邱清泉部发动突然袭击，武装吞并云南龙云地方政权，换上李宗黄、关麟徵等反动军官执掌云南军政大权后，对抗战时期形成的“民主堡垒”昆明实行反共、反人民、反民主、反革命的反动统治，一上台就制造了屠杀革命师生的“一二·一”惨案，杀害“四烈士”，激起全省各族人民的强烈义愤，自此毅然展开了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和争取解放的革命武装斗争。这些运动和斗争，一直持续到49年和平起义，延续到50年3月正式接管。

我由于从小就一直经受贪官污吏、地主恶霸、流氓坏蛋的种种压迫欺凌，怀着对旧社会的仇恨，出于义愤，于1945年12月中自发参加学生运动，参加了对“四烈士”的祭奠吊唁活动和三万人的送葬游行示威行列后，对我的教育启发很大。四十年后的今天，对那首：“天在哭、地在嚎、风唱着催心的悲歌。英勇的烈士啊！今天送你们到那永久的安息地，明天让我们踏着你们的血渍，誓把那反动派消灭……誓